

与闻国是 民主建国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历史道路

□ 孙 信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民建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民主建国的目的，由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一部分同工商业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所创建。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历史转折中，民建放弃了“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与中共合作的历史道路。

秉行民主和建设创立民主建国会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在思考的关系自己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积极组织起来，力争通过政治协商的民主道路，建立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国家。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为推动国共谈判，避免发生内战，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5年7月访问了延安。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有效的。”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为日后新政党的筹组和发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民族资本面临破产的境地。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深感在国民党独裁政权的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要争生存、图发展，就必须组织起来，并开始在工商界爱国人士中酝酿建立组织的活动。胡厥文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事，与黄炎培关系密切。1945年8月21日，黄炎培访问胡厥文，就建立组织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1945年12月16日，在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人的推动下，经过精心筹备，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会议指出筹建民建的宗旨“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基本原则是“保持民主精神”，要“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以大公无私的精神积极奋斗到底”。其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民主和建设。虽然与会者对民建的态度和主张不尽相同，但都表示要遵循“与闻国是”的共同政治立场。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并选举了民主建国会领导机关，其特点是“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会议制决定之”。民主建国会由此正式诞生。

反对内战独裁 争取和平民主

民建成立后，以民主和建设为宗旨，明确提出了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积极投入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伟大斗争中。

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在重庆举行会议。民建因为刚刚成立，又未获国民党政府承认，因此没有代表。黄炎培、李烛尘等虽然以民盟和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实际上代表了民建的意见。会后，民建联系全国邮政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3个单位，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有力地促进政协协议的达成。

政协协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撕毁协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迫害拥护政协协议的民主人士，甚至叫嚣“解散民主建国会”等。民建不畏国民党的迫害，坚决与之斗争，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中公布事件真相，揭露国民党迫害政治协商会议的罪行。

1946年4月12日，民建总会迁到上海。为了呼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民建积极投入了反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6月19日，发表《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章，呼吁各界为和平统一而努力；支持并参加“上海各界赴京请愿团”到南京请愿；“下关事件”发生后，民建发言人发表谈话，强烈要求

“严惩凶手，严惩放纵指使的罪魁祸首”，主张“宣布永久停战，切实保障人民基本自由”等。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并制定宪法，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各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已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何去何从的分水岭。对此，民建于11月初致函第三方面和有关团体，呼吁各界保卫和平、反对内战、维护政协决议，黄炎培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12月31日，民建与民进、九三学社等11个政团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认为25日闭幕的国民党“国民大会”枉自非法通过的“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如果说“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使民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真实面目，那么，国民党组织的“国民大会”的召开，则彻底打破了民建走中间路线的幻想。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国民党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国统区更加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并由所谓的“观察家”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5月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各级党报“揭露”民盟、民建等团体的“共产奸谋”。7月4日，国民党政府悍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民建会所数度被查抄，民建会员遭到迫害。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严酷的现实使民建认识到，实现自身的理想，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惟一的出路。黄炎培曾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响应“五一口号” 参加筹建新中国

《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布后，民建积极响应并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次会议是民建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标志民建彻底放弃了中间路线，走上了接受中共领导同中共合作的正确道路。

1949年1月，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由香港顺利抵达沈阳。在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认为应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1月22日，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与李济深等55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此后，民建积极配合大城市的解放工作，为保护、重建和恢复民族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民建作为党派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黄炎培形象地比喻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所新的大厦，是钢筋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单位就是一根一根的柱子。这钢筋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此，民建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成员，走上了同中共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道路。

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儒生在西汉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人成为王莽篡汉的推手，有些人为之摇旗呐喊，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东汉建立以后，儒生们开始反省儒术的价值和自我的定位。如何立身、如何从政，面临政治威压和个人荣辱该如何选择，都是当时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大事。正因为有了历史的鉴诫，东汉的儒生们更重视名节，重视经受考验，重视在重大转折关头的政治选择，由此涌现出一批经历千年仍旧光彩熠熠的人物——袁安和杨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王臣之烈——袁安：袁安是活动在东汉初的人物。袁安少时修习，为人严重有威，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担任县功曹时，袁安有一次因公事见到州从事，从事希望袁安替他送一封信给县令。袁安断然拒绝，理由是公事可以用官方的邮驿，私事则不是功曹所应该负责的。这种坚持原则的态度，让从事敬畏。

汉明帝时，楚王刘英谋反一案事关重大，情由复杂，导致牵连数千人。皇帝亲自过问，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袁安正是在这个关口受命任楚郡太守一职，到任之际，不经府邸而直奔监狱办公，凡谋反证据不足者尽皆释放。左右向袁安建言，如果轻纵人犯，被人附会为阿附反虏，将是死罪。言外之意，宁可要一条清白，也不能以自家前程性命作保。袁安的回答非常简单：如果确有谋反者被释放，我本人当为此负责，不会连累各位。当袁安将此事的情由上奏以后，汉明帝赞同了他的意见，由此四百多名受牵连的人犯得以释放。虽然，明帝的决定可能有政治角度的考量，但

是袁安能够坚持原则，不得不说是影响汉明帝的因素之一。

袁安后来任司空，位列三公，职位更高，他坚持原则的态度却没有变。汉和帝时，控制朝政的是窦太后。太后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贪功冒进，北击匈奴，袁安与朝中大臣正色阻止。而后袁安又奏免窦宪所用不称职者达四十余人，与窦氏的矛盾逐渐尖锐。

在此天子幼弱、外戚擅权之际，袁安每次朝会，与公卿谈及国家大事，未尝不噙呜流涕，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天子和大臣全以他为依托。可袁安去世太早，在三公位上没能做出更大建树。不过范曄评价他“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就是肯定他当轴之时立身执正，为天下表率，使得外戚不敢太过肆无忌惮。

王臣之节——杨震：杨震是弘农华阴人，他的出生时间史书没有记载，可以推测为西汉末或东汉初。杨震的父亲杨秉是传《欧阳尚书》的大儒，杨震少年时就曾向太常桓郁求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后汉书》记载当时儒生称他为“关西孔子”，足见他学问高妙。汉代任官最重经术，儒生只要明经，仕途相当顺畅。可是杨震闭门教书，直到五十岁时才任于州郡。

此后杨震迅速升迁，先后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杨震赴任途经昌邑时，过去他推荐的荆州人王密正担任昌邑令。王密在晚上拜访杨震，送来黄金十斤。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为何不了解我？王密辩解为晚上无人知晓，意在请杨震收下贿赂。杨震正色说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清廉，虽任职二千石，子孙蔬食步行。有人建议他经营产业，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并非仅以清廉著称，更以敢直言进谏闻名。汉安帝时，杨震先后为司徒、太尉，位列三公。汉安帝信任左右佞幸外戚，当外有寇患、内生交异之际，提拔小人，骄纵亲近。杨震多次上书，称他们“白黑混淆”“卖弄威福”，既削弱了皇帝的权威，更腐蚀了国家的根本。这些建议，皇帝听不进去，被指摘的佞幸们也都很目愤怨，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扳倒杨震的机会。

这一年天象有变，诸人诬陷杨震心怀不轨，导致天生异常。汉安帝听从诬告，收杨震印绶；小人们仍不满意，又鼓动皇帝遣发杨震归本郡。

当此天变地动，内忧外患之际，杨震平生的抱负化为流水。往日的清白与正直，抵不上宫廷之中的几句谗

东汉政坛的双子星——袁安与杨震

□ 曲柄睿

言。行走至洛阳城西阳亭，杨震面对送别的诸子门生，慷慨说道：“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载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祭祠。”而后饮鸩自尽。大丈夫意气生乎，虽死而言不及家，千载后读史仍想见其人。范曄称赞杨震“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是洞悉肺腑之言。

士人阶层的崛起。袁安和杨震当然不是东汉仅有的正直大臣，也不是东汉最后的正直大臣，但是他们的出现，隐隐然表现出东汉士人阶层崛起的态势。

东汉初年，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尽快恢复生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不很明显。到了汉和帝、汉安帝执政以后，外戚和宦官干政，逐渐成为东汉政权两大顽疾。而朝中坚持原则的士人，与外戚和宦官又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东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成为了左右政局发展的关键。

成为士人的起码条件是掌握知识，儒生就是士大夫的主体。而经书中倡导的种种做人准则与为国为民之道，激励着他们砥砺名节，献中守正。固然，外戚和宦官中不乏受过经

学教育和忧心国事之辈，但其主体却多为扩大自己权势和利益的贪墨之徒。政治操守和行为准则上的巨大反差，使士人阶层和外戚、宦官的矛盾不可调和。

士人周围又团结着门生故吏。门生不一定受学，只是表达一种彼此连接的关系。故吏则代表曾在某人手下为官或受其举荐。门生和故吏是一种依附性群体，他们数量庞大，声势也壮，其中鱼龙混杂，未必都是德行高妙之辈。换言之，本来代表着高尚节操的士人，因为门生故吏的加入，也愈向着政治集团的方向演化了。

这样一来，东汉的政局出现了士人、外戚、宦官三方鼎立的局面。虽然宦官和外戚之间也有矛盾，但是两者往往联合起来与士人为敌。士人抨击外戚、宦官扰乱国家常套，但也不能保证门生、故吏完全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立身行事。东汉中期以后的政治，围绕着士人、外戚、宦官的矛盾展开。

东汉豪强。如果要进一步追溯士人的主张，不得不回到汉代的历史实际中去。其实自西汉以后，豪强势力的崛起就成了典型的社会问题。豪强在乡里有极大势力，他们兼并土地，迫使自耕农沦为依附民。当然随着天灾战乱的发动，有些自耕农为了

人物志

吕范当官

□ 崔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官为宦，大都希望“步步高升”，而三国时代的东吴有一位吕范，却自请小官，乐此不疲。

吕范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伴随东吴起家的元勋重臣。孙策寄人篱下、在袁术帐下效力之时，就和吕范相交，引为知己。吕范率门客百人归于孙策，成其左膀右臂，外为君臣，实则骨肉，视为至亲。孙策草创阶段，在袁术和吕孙之中夹缝求生，寻求发展机会，排除万难终于成势。吕范紧随孙策，披坚执锐，参与了进攻庐江、横江、当利、丹阳、湖孰等平定江东的诸多硬战，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将。在攻取丹阳后，吕大将军急切“求官”，这完全出乎孙策意料。

吕范不求大官，而是求小官，放着将军不当，请求改任都督。此都督非彼都督，不是日后周瑜所任的威风八面的“大都督”，而只是主管执行军纪、整编部队的“小都督”。孙策大惑不解，问道：“子衡已有大众，岂宜复屈小职！”吕范解释道，自己和东吴荣辱与共，求任都督，既是为江东大业，也是为自己。吕范急求小官的真正目的在于整肃军纪。孙策的势力在江东急速扩张，不断有人来投，所辖部队成分复杂，军纪有所松懈，吕范在持续的高歌猛进中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到“譬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由此，吕范自请担任监督军纪的都督。

古今中外，军纪向来是一个大问题。一是强大战斗力来自严明军纪，二是人心民望来自严明军纪。孙策要有效占据江东，必须先得人心，再图长远之计。严明军纪以区别其他割据势力、超越其他割据势力，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吕范官越当越小，事越做越实，把这个“小都督”当得有板有眼，不仅整顿军务、严明军纪、令行禁止，而且使军中各方势力和睦相处、团结合作。

吕范一向坚守原则，早期还曾主管过财务工作。那时，孙权年少，有些私事开销想请吕范暗中通融。但吕范从不做“顺水人情”，事无巨细必定报告孙策，这些“小事”给孙权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后反而信任并重用吕范。“吕老夫子”的威严，江东

远近皆知，陆逊、全琮等大族子弟对其都是毕恭毕敬，不敢怠慢，生怕有事“栽”到这位古板的“老夫子”手上。

吕范不仅刚正不阿，还是文武兼备的全才，深受孙策、孙权两代吴主重视。赤壁之战后，刘备来江东拜访孙权，吕范曾密奏孙权，要“留”住刘备。虽然当时未被采纳，但足见吕范的战略眼光。后来，孙权领军征讨关羽，还和吕范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早听卿言，无需此劳，并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吕范。

吕范去世后，孙权路过其墓，触景生情，悲叹斯人，涕泪俱下，祀以太牢大礼。吕范当官，公而忘私，不计得失，因公生明，因公生能，真乃豪杰。

避役，也乐于依附于豪强名下。于是豪强与国家展开了争夺人口的拉锯战。谁能控制更多的人口，谁就能控制政权。

光武皇帝刘秀本来就是南阳的豪强，他建立的东汉政权可以看作数个最大豪强集团联合各地中小豪强集团的统治体。正因为如此，东汉政权虽然出台了一些限制豪强的政策，但是并不能触及豪强力量的根本。外戚、宦官甚至部分士人都是豪强。

东汉末的士人仲长统形容豪强的生活状况是“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他们依赖商业活动和土地兼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富贵以后便拥有了权力，所谓“睚眦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更有甚者，豪强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豢养死士，贿赂权贵，犯法不坐，使得普通百姓怒不敢言，怨不敢诉。东汉的社会风气，至此大坏。

宦官和外戚就是豪强在洛阳的代表，也是最有力量的豪强。士人虽然也有出身豪强者，但他们受到儒家教化的熏陶，对宦官和外戚鱼肉乡里的行为极不满意，更不能容忍他们腐蚀汉政权的根基。士人与宦官、外戚的激烈冲突，自然也可以看作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也可以注意到其中蕴藏的价值观念的尖锐差异和社会责任感的不同。